

目 录

鄂豫边区游击队的统战工作·····	周骏鸣 (1)
回忆北伐时期逐鹿中原的军事混乱局面·····	张钊遗稿 (10)
洛阳西工史话·····	郭文轩 (48)
我所了解的吴佩孚陆军第三师·····	康永奇 (61)
洛阳地区红枪会的兴起与消灭·····	柴化周 (66)
附：白村浩劫·····	张修斋遗稿 (80)
豫东通许、杞县、睢县红枪会活动概况·····	韩晓亭 (82)
忆三十年代开封北仓女中学生运动·····	赵新 曾克 曾兰 (90)
怀念北仓·····	冯素陶 (133)
忆老校长马戡武与北仓学生自治会·····	崔 明 (144)
王天纵卒于川·····	痴 人 (158)
【质疑·补充·订正】	
对《张钊事略》一文的几点质疑·····	张应超 (154)
【补白】	
“博爱”、“民权”等县的来历·····	郭晓棠 (143)

鄂豫边区游击队的统战工作

周骏鸣

本文是《河南文史资料》第七辑所载《鄂豫边区游击队的诞生和发展》的续篇。作者周骏鸣，是鄂豫边区游击队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本文原题《鄂豫边区游击队的土政策》，内容主要记述这支游击队在同上级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本着“多交朋友，少得罪人”的指导思想，开展了统战工作，使游击队保存下来并得到发展。为免生歧义起见，编者对题目稍作变动，文则依旧。

鄂豫边区，指的是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南部几个县的活动地区，中心区域在河南省确山、信阳、桐柏、泌阳四县交界的大山区。这里属于桐柏山区。这个区域有一座名山，叫桐山，风景幽美，人们赞为“桐峰叠翠”。鄂豫边区根据地也叫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已载入《毛泽东选集》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一文的附注里，是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十四个游击根据地之一。当时，我们鄂豫边区省委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多数虽读过孔夫子的书，但没有学过马列主义；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致使鄂豫边区党组织

只剩下几个同志没有被捕，也同中央失掉了联系。经过几次暴动失败的教训，我们已意识到革命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我们就选择确山、信阳、桐柏、泌阳交界地区作为开展游击战的中心区。这个地区都是山区，人民贫苦，土匪经常出没，国民党反动统治薄弱，对开展游击战争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省委委员中有三个同志经常在这个地区工作，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游击队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夏历乙亥年腊月初十）在信阳县西北约九十华里吴家尖山小石岭村诞生。一开始，我们力量小得可怜，只有七个人，长短枪三支。这样小的力量怎么能生存和发展呢？说老实话，当时我们还不大明确“政策”这个概念，只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说，客观实际向我们提出了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行动，甚至不能生存下去。我们并不知道马列主义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也不知道毛主席是怎样说的，我们只知道有一句老话：“多交一个朋友多条路”。我们就根据这句话，提出了几条办法。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鄂豫边区游击队的土政策，其中也包括方针和策略问题。为了避免同我以前所写的《鄂豫边区游击队的诞生和发展》一文（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七辑）重复，有几个问题，如“打坏货，拉土豪”、“对土匪实行大股拉小股打的办法”、“帮助群众成立抗日自卫委员会和抗日自卫队”等，本文就从略了。

一、多交朋友，少得罪人

根据这一政策，不论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土匪流氓，只要不是坚决反共的，广大群众也不大痛恨的，愿意同我们交朋友讲联合的，我们都可以同他交朋友，而集中力量打击政治上最反动

的、群众最痛恨的家伙。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只要对我们有利的事就干。如泌阳县邓庄铺有个联保主任叫李耀堂，吸大烟，还做买卖，我们原来认为他是个小地主兼资本家，打算把他干掉，因邓庄铺在游击区的中心，我们以为去掉他这个“钉子”，游击区在这一带就联成一片了。有一天，我们住在邓庄铺附近，李耀堂找一个同我们有联系的人领着他来见我们，带着大烟、老海，因他把我们误认为土匪了，大烟、老海是土匪的见面礼。既然来了，当然不能把他干掉，我们就摆上大烟灯，陪他抽大烟，不然他害怕，不敢同我们讲实话。大烟一抽，就谈开了。他完全赞同我们的革命主张。这个人从此成了我们的朋友。他虽然当了国民党的联保主任，但他出身贫苦，对穷人很表同情，穷人找他办事他都热情帮忙，毫无官僚架子。另外，他特别聪明，土豪劣绅、军阀、土匪，他都能把关系搞的很好，人们称他“四面光”，我们同他开玩笑，说他“八面光”。我们利用他这个特点，做了很多共产党员做不到的工作。此人以后戒了大烟，参加了共产党，曾在新四军五师跟李先念同志当副官，在湖北某地一次对日军作战中牺牲了。又如信阳县吴家尖山附近有一个农民，爱交朋友。有一天，我们的游击队住到他家里，他要同我们拜把子，如同《三国演义》上说的“桃园三结义”那样，这事在“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下是不允许的，经过游击队支部讨论，认为对我们有利没有害，决定同他拜把子。共八个人，老大哥排在最前头，年纪最小的排在最后头，都跪在地下。老大拿一把点燃的香，首先发誓说：我同某几人拜为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祸同担；谁要有三心二意，要炮打穿心过。老大发誓之后，叩个头，把香火传给第二个人照样说一遍。挨次照样传下去。拜了把兄弟之后，这个农民对我们游击队真是亲如兄

弟，以后再见面，当地敌人的活动情况他都告诉我们，帮了我们许多忙。我们这个“多交朋友少得罪人”的政策，一直贯彻到一九三八年初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但在这中间，我们犯过一次永不能忘记的错误，就是我在《鄂豫边区游击队的诞生和发展》一文第七节中所说的要干掉确山县石滚河联保主任赵子敬那件事，政策错了，给游击队带来很大损失。如果不犯这一次错误，当地是没有人能够组织起力量打我们的。事实证明多交朋友少得罪人的政策完全正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统一战线政策。

二、秘密行动，荫蔽发展

因我们力量太小了，只有六七个人，小得不能见天日，我们就只好秘密行动，荫蔽发展。不散传单，不喊口号。过去“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做法，实际上是自我暴露目标，招引敌人来消灭自己。这个苦头我们吃得太多了，再不能干那种蠢事了。我们的行动完全是秘密的，白天在群众家里荫蔽起来，夜间人都睡了，再出来活动；不能惊动村上的人，不能引起狗叫，而且一个村子只能住一夜，谨防泄密而被敌人追捕或包围。我们用这个办法，活动了两年多，以昼作夜，行动机密，敌人始终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住在什么地方。一九三七年我到延安时，中央组织部有个同志拿一份《大公报》给我看，上面载着：“赤匪”某人有十个游击大队在某地活动。那位同志问，这是否讲的我们。我看了那条消息，真觉得好笑。实际上我们那时只有一个大队，一百多人，《大公报》是当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三、依靠群众

朱德同志说过：游击队同群众的关系，如鱼同水的关系。鱼离了水当然不能活。在实践中，我们对这个道理体会得特别深刻。不仅是鱼同水的关系，而且是子与母的关系。初生的婴儿，没有母亲精心抚养是不能长大成人的；初生的游击队也是如此。我们两次遭受严重打击，几乎被敌人消灭，主要是因为脱离了群众。受到教训之后，再不敢脱离群众了。凡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好的村子，再不能去住了。在被迫的情况下去住，必须夜里把村子围起来，先叫出一个人，向他宣传，再由他召集全村的人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要他们保密，严令不准出去。这是万不得已时采取的办法。一般的都是事前做好工作。进村时先喊出一个人，通知各家把狗管理好，不让乱叫，再安排人的住处，谁家住几个人。群众做这事非常熟练，很快就安排好了。紧接着他们就开会，分配明天的工作任务：谁去侦察敌人，谁去赶集给游击队买吃的。游击队生活紧张、艰苦，又没有薪饷，靠什么照顾同志们的生活？就是经常要吃肉。所以游击队一住下，群众很快就分配好哪几家分别到几个肉架子上去买肉；不然，一个庄上突然到一处买几十斤肉，一定会引起敌人怀疑。不过时间久了，这个秘密被卖肉的发觉了，他看到这个庄上很多人买肉，就知道游击队在这个村上住，比较熟悉的有时也会问：“他们来了吧？”但从不泄露秘密。事实使我们深切体会到，群众与游击队，真是如同母子一般关系密切。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但当时我们提不到理论上去认识。

四、尽量避免同敌人作战，不打无把握之仗

这一条，也是由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况决定的。拿作买卖作比方，我们的本钱太小了，所以我们提出：避免同敌人作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实践证明，这个决策完全正确。有一次我们行军走了差不多一夜，还下着小雨，天快明时，走到确山县西、石滚河东十二华里的高庄宿营。我们派出的站岗的在高粱地里隐蔽着，一支国民党部队开过来，他未发现。这支国民党部队是一个连，由瓦岗镇以北出发去打土匪。我们住下，派了当地的同志去监视瓦岗方面的敌人，结果他出去不远就遇见瓦岗开过来的军队抓他带路，他说他正在种地，牲口还在地里，不能离开，结果没去给军队带路，但他不能转回给游击队报告。第二个派出去侦察的当地人是个木匠，非常聪明，而且有胆量，他一出门就遇到这支军队，军队问他土匪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在南边山里头；军队要他带路，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带着军队就走了。他同军队谈话时，同游击队只隔一堵墙，我们在墙里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看着军队同木匠谈话，前边是个连长，跟着两个护兵，背着驳壳枪和大刀；后边的士兵都停在路上，把帽子摘下当扇子扇。这时我们游击队如果实行突然袭击，可以把这个连打垮，缴一部分枪，但这个庄上的群众要受到伤害，所以我们避免了这次战斗。军队被聪明而勇敢的木匠领到山里去打土匪了。事后有争论，有的说应该打，有的说不应该打。一九三七年，我曾就此事在延安问过朱总司令，他说不应打，打了老百姓要遭殃。我们所打的土豪劣绅的围子和碉堡，没有打不开的。土匪成百上千人打不开的，我们游击队几十个人就打开了，甚至四五个手枪队员就打开了。

这不是游击队有什么特殊本领，主要是事先把群众工作做好，用里应外合的办法打开的。土豪劣绅对我们怕得要死，他们根本不知道游击队从何而来。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再列举了。

五、组织严密，成分纯洁

过去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发展一点力量就要暴动，这等于报告敌人来消灭我们。暴动失败了，还瞎吹政治影响如何如何，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好的同志，不了解一个农民变成一个游击队员不是那么容易的。突然发展一百多人或几百人，不要说打仗了，就吃饭这一个问题都很不好办；反革命来镇压，一听见枪声就散伙了。结果发展得很快，失败得很惨。这不是一次的教训，而是重复几次的错误。我们不能再干这样愚不可及的蠢事了。因此，游击队员都是由地方党选送的，成份除少数知识分子外，都是贫苦农民，必须有牺牲一切为革命的精神，如父母被抓去、抄家，搞得倾家荡产也不顾，连自己的性命都准备牺牲。同志们在战场牺牲了，尸体我们是不收的，不是我们冷酷无情，而是我们没有条件去搬尸。如队长王国平同志和几个队员被包围牺牲，头被敌人割掉；省委书记张星江同志牺牲时敌人追着我们喊“捉活的”，我们怎么去收尸呢？这样，对游击队员的斗争情绪是否有影响呢？毫无影响。我们为牺牲的领导和战友痛哭一场，擦干了眼泪继续坚决奋斗。同志们已经懂得：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那个时候入党有一句誓词，叫“牺牲一切为革命”。所以游击队员是地方党挑选来的有觉悟的贫苦农民，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是最纯洁的青年。有一次，确山竹沟附近一个小青年刚结了婚，父母都死了，只有小两口，他非要参加游击队不可。我们调查的很清楚，他参

加了游击队老婆保不住，我们说明坚决不要他，他就坚决不走，用棍子打也打不走，最后只好把他收下，老婆很快就被坏货卖了。游击队没有薪饷制，吃饭穿衣都靠打土豪。组织要严，成份要纯，主要是怕意志不坚定者叛变投敌，带着敌人捉我们。出了叛徒最伤脑筋。我们游击队几年当中没有出叛徒，但是出了土匪。有一个游击队员在游击队学了一点本领，他想拉一股人单干，结果他跑出去，拉了一个小杆子，共八个人。这是由于起初我们只注意发展，不注意质量，也没有严格的纪律所造成的。有一天游击队把他八个都捉住了，全部砍了头。失败是成功之母，以后我们就注意队伍的质量了。

六、吸大烟，扒洋钱

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游击队吸大烟是不允许的。但在群众有吸大烟习惯的情况下，不应酬一下，很多事情不好办。而且反革命还要借此造谣，说共产党抓住吸大烟的就杀，因而很多吸大烟的怕我们，特别是当土匪的，因土匪当中很多人吸大烟。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小土匪头，我们就同他一起吸大烟，开始他很害怕，等我们真正的吸起来了，他就从床上跳下来，拍着屁股说：“你们还会抽大烟呀？人家都说你们抓住吸大烟的就杀。”我们告诉他，这是反革命造谣，不要听他的。从此，土匪就不怕我们了，我们才能进行匪运工作。还有一个小地主，比较靠近我们，要请我们吃饭。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接受人家请吃饭，可我们一再拒绝也不行，最后只好去了。但他请客首先摆上大烟灯，不吸大烟是不能吃饭的，这是当地的习惯。不吸大烟甚至话都谈不下去。我们不得不应酬一下。把大烟一吸，他讲实话了。他说：“你

们打的土豪，洋钱你们没有找到呀，都在地下埋着呀！他也未敢扒出来，扒出来没有地方放。”他说的那家土豪已跑到外地去住了。我们正住在他家里。听这人说的有道理，我们第二天早晨就动员少年先锋队扒洋钱，一个队员在猪窝里扒出一罐子洋钱和元宝。这个消息很快轰动开了，不到几个钟头，扒出五千多现洋和好几个大元宝。这是游击队第一次发了大洋财。但游击队订了一条纪律，为了工作吸大烟应酬一下可以，但不能吸上瘾。只能往外冒烟，不能往肚里咽，更不准带大烟枪。我们对一切事情都根据实际情况办理。吸大烟本来是坏事，但我们利用它办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这叫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不受教条束缚。

一九八三年二月

（本文作者周骏鸣，一九〇二年生。河南确山人。一九三四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任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队长、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团长。一九三八年以后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副团长、五支队副司令员、二师参谋长、淮南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新二师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建国后任水利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回忆北伐期间逐鹿中原的军事混乱局面

张 飡

张飡在辛亥革命时担任过陕西起义军东征大都督，豫、陕两省有不少军政要人是他的朋友或部属，本文中记述了北伐时期于右任、冯玉祥、刘积学、吴佩孚、刘镇华、张治公、靳云鹗等同他的接触，和他在各股军事力量之间的活动情形。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北伐期间，河南成为新旧和南北东西各方面军事势力争夺之焦点，形成了“中原逐鹿”的局面。吴佩孚在武汉战败，率残部退驻河南，犹思作困兽之斗，以保持其所谓中原根据地。张作霖乘机以援吴讨赤为名，派张学良、韩麟春之三、四方面军侵入豫北，进出河南。张宗昌亦派直鲁联军进占豫东。刘镇华在围攻西安八个月失败之后，退驻豫西。武汉方面之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继续北伐，首攻郑、汴。冯玉祥出师潼关，东攻洛、郑。还有靳云鹗对吴怀斌，率其部下三四个师屯驻新郑迄驻马店、汝南间地区。另有河南地方性部队张治公部驻扎洛阳一带，樊钟秀部驻扎鲁山、宝丰、郟县、方城一带，李振亚部驻禹州一带，马文德部驻南阳一带。有的偏僻县份为当地民团、枪会所控制。嗣张作霖又派赵倜、陈树藩等已经下台的军阀到豫，也思乘此乱局东山再起，发委状，收部伍，搞的乌烟瘴气。在民国十六年这一年，连地方武力在内，河南境内的队伍不

下百余万人，全省一百一十二县，几乎无县无兵，食用所需，皆出于人民身上。

这些军事势力，相互间明争暗斗，风云变幻，此消彼长，朝秦暮楚。所苦者，惟我中原人民。

我是河南人，当时正在家乡，目击心伤，惟希望北伐早日成功，以苏民困。因而奔走豫、陕间，促其实现。孰意以后北伐中途变了质，新的统治者又变成了新军阀，依旧内战不已，祸国殃民。每一思及，良深浩叹！直到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解放了全国，河南人民才和全国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观今比昔，益觉今是昨非。缘将当时所闻所见，回忆记其梗概，以作史料参考。如有错误之处，尚希知者指正为幸。

吴佩孚众叛亲离，穷途末路

吴佩孚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在武汉被北伐军打败后，仓皇率其所谓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及卫队旅（旅长姜云鹤）逃回郑州。这时他的残部还有张席珍、阎治堂、田维勤、王文蔚、王维城、陈文钊、高汝桐、阎悦仁、徐寿椿、任应岐、李振亚等十余个师，连同魏益三部的三个师，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的一个师，以及河南军务督办寇英杰所辖各镇守使的地方部队，约计尚有十五万至二十万之众。如果再加上豫西的张治公部及由陕退到豫西的刘镇华部，还是不小的一支力量。但由于武汉大败之余，大部兵力尚在鄂豫间地区向北败退奔逃中，秩序极乱，马上掌握不起来，又由于北伐军方面秘密派出人员分别向吴的残部将领进行策动收编工作，而多数将领犹豫不定，对吴渐怀贰心。吴此时所能直接掌握者，仅张席珍之第三师、阎治堂之第四师及卫队旅而已，其余均

有尾大不掉之势。尤以吴佩孚自败回郑州后，军费军粮及其他军需物资，均毫无办法，各部队皆往往以粮饷无着为理由，拒受吴之调动。但吴不自量力，犹复刚愎自用，对部下仍图颐指气使，因之军心益为涣散。自九月退回河南后，直到年底，在军事力量上并没有能作有效之整理，在内部人事团结上也没有什么改进，相反又现其秀才故态，借酒浇愁，有时酒后骂孙传芳不讲义气（指孙不派兵援助武汉战事），骂张作霖不顾交情（指张派兵接收直隶保定、大名一带原属吴部之防务和税收）。这表现吴佩孚之颓势已成，一筹莫展。

吴佩孚是九月十七日由湖北败到郑州，恰巧也正在这一天，他的死对头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接着就挥军南下，先解决吴佩孚在甘肃的军事力量。其时，陇东镇守使张兆甲、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以及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原均属直系或接近直系，冯玉祥以联马除直之策，先后收编了诸马部队。然后派兵分向天水、平凉攻击孔繁锦、张兆甲，孔、张不敌，电吴求援。吴佩孚此时正自顾不暇，哪有余力援甘，只作了一个画饼充饥的处置，电正在围攻西安的刘镇华抽派部队，进援孔、张。刘镇华围攻西安，师老无功，也无余力援甘。不久孔、张部队全被冯军解决。孙良诚、马鸿逵等部于十一月初旬进入陕境，于下旬击败了刘镇华的镇嵩军，解了西安八个月之围，并积极向东追击刘部，进占潼关。

吴佩孚屡接刘镇华求援电报，十二月初旬，刘镇华又亲到郑州见吴求援，也未谈出有效办法。冯军继续东进，已入豫境阌乡，进逼灵宝。吴认为豫西形势的严重已超过豫南（此时北伐军还未大举北进），不能坐以待毙，才召集靳云鹗、寇英杰以下师长以上的将领在郑州开军事会议，研商对策。会上，吴大骂冯玉

祥，历数其破坏直系团体、犯上作乱之罪恶，又指出冯近竟勾连“赤贼”（指北伐军）企图夹击中原之危险，若不先讨冯，我们在中原将无立锥之地。他讲话的用意是想激起诸将领同仇敌忾的义愤，从而收团结一致、击冯图存的效果。不意他大声疾呼了半天，诸将领竟无一人发言捧场，特别是他内心原希望靳云鹗、寇英杰能继他之后有积极表示，但靳、寇静聆大帅讲话后表情冷静，还是一言不发。这简直使“吴大帅”下不了台。吴不能不点名了。他转过脸来对靳云鹗说：“荐青有何良策？”靳云鹗只得站起来说：“大帅所说全是对的，尤其豫西问题，确比豫南重要。但作战要知己知彼，我们目前粮饷全无，冬天已到，许多部队还没有棉衣，尤其自武汉作战之后到现在也没补充过子弹，这些自己方面的情况也是要顾虑到的。”靳的这番话，不但没替吴捧场，反泄了吴的气。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吴气愤之余，对众表示自己亲带第三师（张席珍）、第四师（阎治堂）去打冯玉祥。众将领看大帅已经生气，这才群起说了些圆场的话，请吴部署讨冯军事，大众一致遵从命令。当场吴派田维勤（陕西人）升任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援陕总司令，指挥王文蔚、王维城及田自己的部队向西进击冯玉祥军。又当场派靳云鹗负责豫南方面，指挥高汝桐、阎悦仁、徐寿椿、任应岐等师对北伐军防守。这算勉强结束了这次军事会议的尴尬局面。

表面终是表面，内里吴与靳的分歧反而愈形加深，其主要原因仍是基于吴和靳对外方针的不同。在国民军还未退出北京之前，靳是力主联冯反奉的，他并与冯部的张之江、鹿钟麟进行了多次协商和联系，而吴则坚决主张联奉讨冯，并且非把冯部彻底消灭不可。因此，吴曾一度免去靳云鹗的副总司令及其兼职。后因在湖北对北伐军作战，不得已才又起用了靳云鹗，但吴、靳心中始终

未消除矛盾。现在奉张逼近豫北，冯玉祥进入了豫西，又面临联冯联张的旧问题，自然各怀鬼胎。吴在会后考虑了这个问题，就于次日又开会，当场宣布以靳云鹗在援鄂战争（即与北伐军作战）中逗留不进贻误戎机为措辞，免去靳云鹗副总司令及前敌总指挥本兼各职，并以寇英杰接替靳所遗本兼各职，另调田维勤、魏益三为前敌副总指挥，改任王维城为援陕总司令。靳虽表面上遵令解职，实际上仍控制着豫南所指挥的兵力，并且与魏益三暗中拉拢。寇英杰虽受新职，实际上抓不住靳的队伍。王维城之援陕，也因兵力不足和弹药缺乏，而迟迟未能行动。寇英杰看吴无力控制靳部，就秘密与张作霖联系，预作尔后之靠山。

到了一九二七年二月间，奉军荣臻部进驻新乡，鲁军孙殿英部侵入兰封，张作霖夺取中原之志已见诸行动。吴电张责问，张复电斥吴：“责人则明，责己则暗，毋乃不恕！”接着奉军于三月间先后由郑州东、西两面之阳武和荥泽渡过黄河，夹击郑州。吴力不能敌，仓皇率总部及卫队逃离郑州，移驻巩县，并急调张席珍、阎治堂两师在汜水虎牢关一带山隘据守，防奉军西进。

这时的吴大帅已处于众叛亲离，濒于土崩瓦解之境。他曾写信请我到巩一谈，我未去，仅复他一信。内容大致是：“今日局势，迥非昔比。为公着想，亟宜捐除成见，改弦更张，南联武汉，西和焕章，然后团结内部，回戈北指，共建全国统一大业，俾救人民于火热水深。素仰公为俊杰之首，际此当识时务之机，如蒙采纳，窃当不辞奔走之责，向西、南两方代为折冲。否则，巩、汜非久居之地，望早作善图”。吴对我的信未作答复，以后我即赴陕。约五月中旬，奉军向西进攻，吴的三、四两师兵无斗志，未作激烈抵抗，即缴械溃散。吴又仓皇率卫队及总部人员向南逃走，沿途受到地方民团和红枪会的不断截击。到登封后稍事喘息，又

向南阳方面逃窜，途中又受到樊钟秀部的追击，状极狼狈。以后跑到襄樊，得到于学忠的掩护，辗转进入四川。

王维城、陈文钊两师在密县附近受到奉军压迫和地方团队、红枪会的攻击，放下武器，自行溃散。任应岐师则接受武汉政府之委任，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

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于奉鲁军进入豫境后，归顺奉军，张作霖任米为安国军十八军军长兼毅军总司令，后随奉军在豫之失败而失败。

河南军务督办寇英杰虽是吴佩孚一手提拔而任豫督，但实力不大。靳云鹗被吴免职，吴派寇接任靳的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但他对靳的部队不但指挥不动，而且时感对自己有不利之事发生。因而于二月间以送母去津为借口，离豫赴津，面见张作霖，把吴的内部矛盾和贫困情形报告于张，并表示欢迎奉军早日进驻河南，他愿为前驱。张作霖听了寇英杰的话，意外高兴。因为寇是吴的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认为收买他，在河南的作用很大，就立即任命寇为安国军第十一军团长。寇也立即帮张说话，电劝吴勿再拒奉军入豫，并应与奉军合作。吴佩孚接寇电后，深为震怒，大骂寇无军人品格，并深悔过去自己抑靳宠寇之过。（一九二五年吴佩孚在鄂东山再起，北进击败了国民二军，以靳云鹗之力为多。论功行赏，豫督一职自应属靳。乃吴却任寇英杰为豫督，对靳则仅任以豫省长职务。寇任豫督后，不理政务，惟以声色玩乐为事，以十万元买得名伶碧云霞作妾。人言啧啧，但吴仍信之无疑。）寇因而不敢回豫，直到鲁军进占开封，他才回到商丘，把豫东镇守使郭振才部改编为一个师，对河南其他镇守使所属部队虽也派人收编，但因鞭长莫及，并未成功。以后随奉军在豫之失败而离豫。

靳云鹗组织河南保卫军反奉到底

靳云鹗自被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后，表面上服从并离开部队，住于鸡公山。但实际上暗中仍控制着以高汝桐师为主的各部队，并且与魏益三切取联系。另一面，靳又派人与武汉、蒋介石、冯玉祥三方面都有联系。蒋介石拟委以军长名义，他嫌名义太小，没有接受。是年秋，靳在郑州和我见面，对我说：

“蒋介石太小气了，想叫我当他的军长，这不是糟踏人么！”自寇英杰离豫赴津，靳应高汝桐为首的各师长之请，又回到部队（总部驻漯河）主持一切。吴虽知道，但以奉、鲁进逼日急，寇英杰又投靠了奉张，故亦默然认之，但终未明令复靳职。此时靳仍坚持其始终反奉的主张，派人劝吴下决心反奉，吴刚愎自用惯了，仍不肯明白表示，以彰己过去的错误。因而靳迫不得已，竟脱离吴的系统，于二月底联合魏益三宣布成立河南保卫军，自任总司令，以魏益三为副总司令。把包括田维勤、王文蔚在内的各军师都编为保卫军，号称十万之众，建总司令部于漯河。

三月间，正当奉鲁军大举进入河南，立脚未稳的时候，靳部署了一个急袭进攻，以六个师的兵力分别由尉氏、新郑对开封、中牟、郑州的奉鲁军进行突袭。开封的鲁军孙殿英部和中牟的毅军米振标部俱毫无准备，竟被靳军攻下。郑州是奉军主力所在，虽措手不及，然终在荣臻的指挥下尚能顽强抵抗。靳部主力军长高汝桐乘铁甲车亲赴前线指挥督战，已近郑州豫丰纱厂附近，不意高汝桐所乘之铁甲车受奉军之山野炮集中射击被毁，高亦阵亡，致郑州未能攻克。靳云鹗既痛爱将之阵亡，又受到奉鲁军后续优势兵力之反攻，乃又退回新郑以南地区。此役虽未竟全功，但予奉